

近来读书,发现古代一些名人读书妙法颇多,常以“三”字做归纳总结,“三余”“三上”“三到”,细细品味,颇有趣味,受益匪浅,不妨辑录下来,时时体悟,深得其中奥妙。

三余。《魏略·儒宗董遇读书的典故:董遇少时家贫,每次去山中打柴,都要带着书籍诵读,他哥哥嘲笑他,但董遇还是不改初衷,坚持投闲习读。有读书人向董遇求学,他让人读书“必先读百遍”,并说:“读书百遍,其义自见。”董遇认为,只有多读,才能理解书中的要义。求学者说读书没有太多时间,董遇讲了“三余”的读书观。何为“三余”?他道:“冬者岁之余,夜者日之余,阴雨者时之余也。”冬天岁尾,更深夜静,绵绵阴雨,都是闲暇之余,应当抓住“三余”之际,读读忙时没读完的书。此“三余”之妙尽在不言中,“余”味无穷也!

三上。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欧阳修在“四岁而孤,家贫无资”的境况下,依然勤学苦读,从小到老,一直是“昼夜寝食,惟读书是务”。他读书、写作方式常独辟蹊径,得心应手。欧阳修著有短文《三上》:“钱思公虽生长富贵,而少所嗜好。在西洛时,尝语僚属言:‘平生惟好读书,坐则读经史,卧则读小说,上厕则阅小辞,盖未尝顷刻释卷也。’谢希深亦言:‘宋公垂同在史院,每走厕必挟书以往,讽诵之声琅然,闻于远近,亦笃学如此。’余因谓希深曰:‘余平生所作文章,多在三上,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’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”钱思公(钱惟演)、谢希深(谢绛)、宋公垂(宋绶)都是当时有名的读书人,皆以文学知名一时。他们的读书方式可谓新奇别致,除了坐于书房传统的读,还躺在床上翻阅,甚至夹着书,上厕所也要琅琅诵读。欧阳修呢,他读书作文也是钟情于“三上”,即马背上、枕头上、厕所上,他认为这样读书才有韵味,才读得进去,写东西才灵感频现,构思奇妙。

三到。朱熹是南宋大名鼎鼎的读书人,他关于读书的诗句即有“问渠那得清如许?为有源头活水来”“少年易老学难成,一寸光阴不可轻”。朱熹主张读书要带着疑问来读:“读书,始读未知有疑。其次则渐渐有疑,中则节节是疑。过了这一番后,疑渐渐释,以至融会贯通,都无所疑,方始是学。”这是他读《诗经》时的感悟,知之有疑,疑渐渐解,以至融会贯通,都无所疑后,才感到是真正读懂了。朱熹在《训学斋规》中提及读书要“三到”,他说:“余尝谓,读书有三到,谓心到,眼到,口到。心不在此,则眼不看仔细,心眼既不专一,却只漫浪诵读,决不能记,记亦不能久也。三到之中,心到最急。心既到矣,眼口岂不到乎?”他认为,读书“三到”,即心到、眼到、口到。心思不在书本上,那么眼睛就不会仔细看,心和眼既然不专心致志,只是随随便便地读,就一定不能记住,即使记住了也不能长久。“三到”之中,心到最重要。心既然已经到了,眼和口难道会不到吗?可见集中精力读书的重要。

顾炎武总督读书

江舟

顾炎武,人称亭林先生,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,与黄宗羲、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“三大儒”。

顾炎武自幼勤学。在祖父鑫源公的培养下,他6岁启蒙,10岁就开始读史书、文学名著。11岁那年,祖父鑫源公要求他读完《资治通鉴》,并告诫他说:“读书是圣人之事,现在有的读书人图省事,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,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。”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,读书做学问是

件老老实实的事,必须认真地打牢基础,踏踏实实地对它,来不得半点花架子。顾炎武开始勤奋治学,他采取了“总督读书”的读书法。

首先,自读书之始,他就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,并且做到持之以恒;其次,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再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。按照这种方法,他读完《资治通鉴》后,一部《资治通鉴》书就变成了两部;再次,他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,写下心得体

会。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,后来汇成了著名的《日知录》一书;最后,他在每年春秋两季,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,边默诵,边请人朗读,发现差异,立刻查对。顾炎武规定每天这样温习书籍200页,温习不完,决不休息。

历史学家钱穆称顾炎武读书重实用而不尚空谈,“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,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”。顾炎武所提出的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这一口号,意义和影响深远。

大家风采

节气里的诗情画意

——读《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》

甘武进



“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。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。”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化的产物,也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。由徐立京著、徐冬冬绘的《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》密切关联人和自然、人和风景、人和农业生产的关系,承载人们对天地对生命的思悟,当作者用文字把它们描绘出来,当画家把它们定焦成一幅幅画,节气里的诗情画意,加深了读者对中华传统历法的理解和认识。

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依据北斗七星斗柄旋转指向(又称斗转星移)制定。我国位于北半球,斗转星移时北半球相应地域的自然节律亦在渐变,因此成为古人们判断节气变化的依据。从科学的角度揭示天文气象变化的规律,每个节气都代表着时候、气候、物候,间隔时间15天,每节气分三候,每候5天,所以有七十二候。这是我国最早的结合天文、气象、物候知识指导农事活动的历法。在这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里,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,有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,有自然万物的交叠更替,宏大与精微

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。

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是中华历法对四时变化的概括,也是一首简明、纯真、亲切、充满生活气息的对于天地、对于神州、对于中华民族、对于先祖、对于中国人生命能量的颂歌、情歌。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,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,即太阳到达黄经315度时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描述立春节气与初候“东风解冻”,意思是说,天地阴阳之气的继往开来由立春开始,春木之气,也就是消融冰冻、催生万物的阳气,由此开始主宰天地。

“郊岭风追残雪去,坳溪冰水送破

冰来。”如果说立春是春的建始,那么雨水就是真正气象意义上的春天的到来。“天一生水,春始属木,然生木者,必水也,故立春后继之雨水,且东风既解冻,则散而为雨水矣。”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对雨水节气的解释堪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。这番论述极富美感,“散而为雨”,这是天地间多么美妙的景象!从字里行间,我们仿佛看到了阳气生发、春风浩荡那席卷天地的气势,消融了冻霜的苦寒,化解了残雪的余阴,阴阳二气相搏而产生的雨水散落如花,滋润着万物在初春的暖意里昂扬勃发。

竟这个相对公平。考试可以让你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。”

作家一般是有“自由不羁”的标签的,但在这里,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父亲、老师和寻常大叔的叶兆言。他并不在意别人因为他不够“不羁”而抨击教材和考试制度,对于强大的存在,他的态度是温和的,甚至是妥协的。

再次,先生又是大格局的人。大格局来自大视野,先生的视野来自于个人修为,来自于古都南京,当然一定与他的家庭有关。

在提问环节中,先生对“请谈谈您的祖父叶圣陶先生对您的影响”一问颇不感冒。他说前不久去郑州开新书发布会,展方悬挂的条幅上赫然写着“热烈欢迎叶圣陶孙子叶兆言先生”,让他非常不爽。他说:“写了大半辈子,出了几十本书了,还被称为‘孙子’,这感觉不是滋味。”这句话里,锋芒一放即收,令我窥见先生温和中的刹那冷峻,也许是他作为先锋作家的底色吧——他彻底否认了家庭对他文学上的影响:“家里的大人都反对我学文科。关于这一点,南京的家父和北京的祖父伯父有着惊人的一致。……受家庭影响,在报考大学的时候,我考虑学什么都有可能,可以考虑数学、化学、医学,甚至林业,这都非常自然,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文科。”但是,不可否认的是,先生特殊的家庭环境,少年陪伴祖父的时光,接触的优秀人群,对他的眼界的拓宽、格局的扩展和奠定,一定具有深远的影响。他对世界的考量,一定会有更高的视点,更远的视界,更准的视角。

这样的叶兆言,才会有这样的观点。他真诚,不做惊人之语却隐有风雷之声;他有妥协,有超拔,只忠实于内心;他不以夺人眼球的方式呈现,平淡如说家常。这三个论点,其实是有关联的,核心在于第一个。

说到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,先生说道:“文学就像爱情,它不是非有不可的,就像我们大多数家庭一样,没有爱情依然可以维持。但有了爱情,生活就会美好很多。”他

说,以文学的方式生活,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生活,是最适合他的生活。他说:“别的活我干不来、不想干,唯有写作我干不厌。”他说:“写作是一场冒险,是惊悚的旅行,是一种等待,写完上一句后,你等在那里,想下一句该怎么表达,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。”他说:“文学并不是多么伟大的事情,只是我热爱它罢了。”而能在别的工作上找到快乐和成就感的人,不一定要去从事文学,“作家就应该像普通人一样,他不应该有光环。”

叶先生常被问到:“在鲁迅面前,当代作家是否觉得汗颜?”他说他对这样的提问不以为然。他相信当代作家的成就一定会被认同。他说他对“伟大”、“崇高”、“自由”、“道德”这类的光鲜的大词保持警惕,对“深刻”保持警惕。他真诚地看着后排的学生们,温和地告诫,作文要真实,不要想着拔高,你的阅历、厚度、高度和宽度,还不足以让你具有冲击出珠穆朗玛的能量和能力,而强行拔高就像拼命给一个气球充气,即使不爆裂,也让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内在的空洞。转而他又告诫在场的写作者——这时候的语气却是带着一点冷讽的——他说,不要模仿小孩说真话,其实没有皇帝,不要拿那个不存在的皇帝说事,要真实,真诚地、谦卑地感受这个世界,不要装腔作势,不要以伪装的深沉来掩盖自己的浅薄和躁动。你得老实,你呈现出来的越真实,你就越深刻。你理解不到的深刻,会有别人或后人帮你理解。

由一个钳工成为一个著名作家,叶兆言先生无疑是一个励志人物,但在他的整个讲演中,“享受文学”、“远离名利”、“让文学远离成功学”却是提的最多的短语。在回答“如何将一篇小说改好,发表出来”的提问时,叶先生的嘴角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微笑,他说,在写之前,你认真做了准备;写之中,你全情投入;写之后,你通篇打量,做了修改,那么你就享受了过程,能不能发出来,又有什么关系呢?

在谈到对“地域文化对小说的影响”时,

叶先生的回答也是惊骇四座。他说,我认为没有多大关系,时代已经不一样了,在信息化、全球化时代,企图以地域文化来讨巧是没有前途的。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,你文字自带地域的信息,不必刻意追求。这是一个与大多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不一样的观念。

考量两个提问和两个回答,叶先生的文学态度清晰起来:忠实,享受。他回忆起自己刚刚从事写作的那几年,眼神温情起来。他说他最初的小说是在台历上的,那一年暑假,他一口气写了八个中篇,而且都发出来了,自认为极有文学天赋。可是接下来的整整五年,他写了更多的小说,却没有一篇发出来。他焦虑,怀疑,失去信心,就像困在笼子里的狮子。

“会不会是您祖父特意嘱咐各杂志社,不发表您的作品,以磨练您?”有人这样发问。这个说法让我想起张居正。张居正两岁识字,五岁入学,十二岁中秀才。十三岁参加乡试,以其才华,必然挂桂登科,但作为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为了铸造“国器”,却故意让他落选,使他遭遇挫折,潜心自省,以防骄傲自大,目空一切。

叶兆言笑了。他说,没有那么多鸡汤,文学不是成功学。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,我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,但这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,这沉寂的五年,让我那颗躁动的心沉静下来。我平静下来,做了深刻的内省,我明白我是从心里热爱文学的,我离不开它,那么只有无怨无悔,不管能不能发表。这是五年,而不是前五年,让我彻底爱上了文学,将这一生许给文学。我相信久爱、深爱一定会清洁自己、感动对方,太容易得手反而没意思。

“我说这个,并不是励志,而是告诉大家,爱是单纯的,因而才是美好的。文学要远离成功学,就像女孩子一定要嫁给爱情。”

说,叶先生微笑着看着大家。他的卧垂眼慈和淡然。

台上台下一片寂静,然后被一阵由衷的掌声打破。

叶兆言

文学要远离成功学

董改正